

文学新探索丛书

主编 朱迪光

20世纪末

中国小说创作理论和
创作实践关系研究

涂昊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文学新探索丛书

主编 朱迪光

20 世纪末

中国小说创作理论和
创作实践关系研究

涂昊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 世纪末中国小说创作理论和创作实践关系研究/
涂昊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8
(文学新探索丛书)
ISBN 978-7-5004-6958-2

I. 20… II. 涂… III. 小说—文学研究—中国—
20 世纪 IV. 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75603 号

策划编辑 罗 莉
责任编辑 丁玉灵
责任校对 李 莉
封面设计 毛国宣
版式设计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9.625 插 页 2

字 数 234 千字

定 价 23.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中国小说创作理论历史发展特征述略	(14)
第一节 古典形态小说创作理论	(14)
第二节 近代形态小说创作理论	(17)
第三节 现代形态小说创作理论	(20)
第四节 20 世纪末当代形态小说创作理论	(25)
第二章 世纪末小说创作理论的建构	(30)
第一节 小说创作理论:政治性、认识性、审美性、 文本性、文化性	(31)
第二节 故事理论	(47)
第三节 小说叙事理论	(59)
第四节 小说语言理论	(80)
第五节 小说结构理论	(95)
第六节 小说创作心理理论	(106)

第三章 世纪末中国小说创作理论和创作实践的

关系发展····· (120)

第一节 压力下的修复阶段(1980—1984 年) ····· (122)

第二节 发展中的分裂阶段(1985—1989 年) ····· (127)

第三节 沉寂中的变异阶段(1989—1992 年) ····· (133)

第四节 喧哗中的深化阶段(1993—1999 年) ····· (137)

第四章 小说创作理论和创作实践的关系类型····· (143)

第一节 小说创作理论和创作实践的关系类型····· (144)

第二节 小说创作理论对小说创作实践的影响
及其途径····· (150)

第三节 小说创作理论影响的有限性····· (159)

第五章 创作理论和创作实践关系的个案研究····· (169)

第一节 王蒙:理论与创作的先行者 ····· (170)

第二节 刘庆邦:“以小见心”的短篇小说创作
理论与实践····· (182)

第三节 王朔:通俗小说的创作理论与创作实践 ····· (197)

第四节 莫言:“气味”的追求 ····· (218)

第五节 韩少功:徘徊于诗情与哲理之间 ····· (237)

第六节 贾平凹:矛盾挣扎中的不懈追求 ····· (253)

第七节 王安忆:实践的理论 with 理论的实践 ····· (267)

第六章 图像时代小说创作理论的未来····· (284)

主要参考文献····· (297)

后记····· (303)

绪 论

—

我将本书名称拆解开来，会有“20 世纪末”、“中国小说”、“创作理论”、“创作实践”、“关系研究”这些话题，像曹文轩先生作世纪末文学现象研究一样，围绕这些话题做点文章，也算作是绪论。

（一）20 世纪末

在现代哲学中，“时间”越来越成为重要的命题。现代哲学企图证明：事物在此一时间之中与在彼一时间之中，可能会有不同的运动形式和不同的运行方向；时间的长度隐形地却很神奇地改变着历史，或推动，或延缓，或振奋，或腐蚀乃至泯灭着历史。由此，时间涌动到某一点的时候，总给人以强烈的刺激，即使历史不会将时间一刀两断，人们也习惯、愿意站在时间的点上瞻前顾后，辨识自己的足迹，并对未来抱有一股莫大的希望。文学学术研究上也由此不断地咀嚼“20 世纪文学史”、“1903 年文学”、“1948 年文学”、“1985 年文学”这些文学短句。而世纪末

成为当前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字眼之一。

“世纪末”是一个文化概念。其核心蕴含是，随着一个世纪的时间周期的滑动，人类做成了什么？哪些值得庆幸和喜悦，哪些遭遇了尴尬和失败？相应地，在一个新的世纪即将来临之时，人类又可以期望什么？鉴往以知来，“世纪末”是批判的，是指向未来的，是文化省思的界标。也正因如此，“世纪末”带给人的是喜、怒、哀、乐，是绝望、期望，是悲观、乐观。“世纪末”永远是理性的，也永远是充满抒情意味的。

本书的“20 世纪末”，取“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之意，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是 20 世纪最后二十年，它不但是百年周期的尾声，更遭逢千年纪元的终结，这种遇合，使人们更深沉地回首历史的更替。它也是人类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的关键时期，由曾经互不对话的坚壁对垒的各种意识形态、思想流派，逐步走向对话与沟通、协作与共建。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实在是世纪末的文学，强烈地涌动着骚动与反思、焦虑与希望交织的世纪末情绪。

我在以后的文章中，将会指出 20 世纪末中国小说创作理论确实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但我也并不想过多地渲染“20 世纪末”这个时间概念。我取这个概念同样只是研究上的方便，将自己的学术注意力限定在一个有限的时间之内。

（二）中国小说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中国小说界所发生的一切，程度不同地受到了外来思潮的影响。但是中国作家对西方思潮的模仿也不是纯粹的模仿，中国作家有自己面临的社会问题，也有自己面临的文化问题，更有自己独有的感觉与经验，曹文轩先生曾指出，中国不愿也不可能与世界雷同，只有认清这样的中国，才有可能

去真正理解与把握它的文学。这就决定了中国文学 20 年的历程充满了艰难、曲折、困惑与痛苦，同时也表现出了自身强劲的艺术生命力。

面对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小说，人们往往会因怀旧产生一种近似历史循环论的看法，认为八九十年代的文学重蹈了“五四”以后中国新文学的老路。其实与“五四”新文学相比，八九十年代的文学是以一种日趋成熟的文学形态融入世界文学之中的，而“五四”新文学则基本上是由欧美（包括日本）文学催生的，两者的文学构成及其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是完全不同的。世纪末的文学特别是 80 年代中期以后的文学分流，即消解主流文学之后的多元发展，中国小说与整个中国文学一样更具有一种内在的张力，更显得充满自信。因此，可以说，中国小说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进程，是一个不断获得世界文学品质并不断融入世界文学中去的过程。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小说，不仅是对外国小说的批判继承，同样也不仅仅是对自身传统小说的融化吸收，它是一种兼容并包的大度，是一种可持续性的发展，我们有理由给以乐观的期待。

（三）创作理论

创作理论就是以一种理论态度对有关文学创作的各种基本问题予以阐释，或者对各种文学创作现象的理论概括。它属于文学理论的核心范畴，属于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文学有其固有的特性，是实现意识形态功能的最佳方式之一，而创作理论因其与文学的直接的紧密联系而成为意识形态进入文学领域必不可少的中介环节。

创作理论作为一个言说领域从来就是各种社会文化价值观念觊觎的对象，各种文化价值观念都试图将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充到

创作理论这种独特的重要的言说领域之中。它们采用的方式常常是将自己的理论话语乔装成创作理论话语，以专业言说的面目出现。当人们接受这种貌似纯粹知识形态的创作理论话语之时，某种意识形态色彩的价值观念便悄悄地进入了人们的意识，从而实现其话语权。

任何国家的意识形态都不会忽视对创作理论的渗透。在西方，具有明显意识形态倾向的创作观念在某些特定时期表现得非常突出，如古希腊时期、中世纪、14 世纪到 16 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17 世纪古典主义时期、18 世纪启蒙运动时期。在当代，随着现代性范畴的思想解放与精神自由观念成为普遍的价值取向，再加上属于后现代思潮的怀疑精神的影响，创作理论的意识形态不再显赫，但是其以改头换面的形式进入创作理论领域却是不容忽视的事实。而在中国，意识形态影响极为突出，成为意识形态之工具的创作理论常常居于主流地位。

在当代学术语境中，创作理论被理解为对文学创作活动普遍规律的阐释，这无疑预设了一个前提：文学创作活动存在某些普遍规律，而且这些规律可以为人们所把握。创作的理论研究者们也由此孜孜不倦地寻求着文学创作活动的普遍规律，这种“求真”的精神也是他们从事创作理论的主要动力之一。但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创作理论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观念系统，价值中立原则在对创作规律的把握过程中是无效的，要想对创作进行纯客观的理论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

可以说，创作规律的寻求过程也是不同主体之间的对话和交流，阐释主体所面对的是另一个主体的言说而不是一个物质性的存在，两者双向开放，双向改造。由此，创作理论不是对创作普遍规律的“发现”，而是在阐释中不断“重构”。

同时，创作理论乃是对创作实践的一种追述、总结和概括的

努力，它是反映的，而不是先验的。因而，创作理论在任何一个发展点上，都不可能是完善的、完成了的终极真理，只有通过永不自满和永不停顿的对创作实践的追述和研究，不停地扬弃自己陈旧的、过时的论点，创作理论才能不断前进。对世纪末中国小说创作理论而言，当中国小说的内容实质发生了变化，而创作理论不能自觉地敏感地意识到这一点，意味着创作理论就会遭遇尴尬。尤其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创作实践新的信息量骤增的年代，创作理论对创作实践的把握更是不易。创作理论的危机始终伴随着创作自身的发展。此种现象不仅是一个长期性的问题，也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话题。

可以说，创作理论的发展，在理论形态上，正是从怀疑乃至否定和批判现存创作理论开始的，正是由于否定，新的创作理论就隐藏在怀疑与否定的背后。创作理论总是在否定中得以发展的，而且这种否定恰恰是理论寻求发展的必然和前奏。正因为如此，创作理论的未来就在创作理论的否定批判中诞生出来。

我希望以小说创作理论作为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研究的切入角度、一个中心问题，探索众多创作理论背后的隐藏了世纪末小说创作实践重要信息的属于我们本土的关键性概念。中国创作理论的未来应该从这些关键性的概念中延伸开来。

（四）创作实践

创作实践问题的提出是哲学意义上实践问题的一种理论延伸，属于理性生活价值反思的必要任务。事实上，“实践”概念最初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是伦理学与政治学反思的一个产物。可以说，实践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感性生活如何可能的问题，而是理性生活如何可能的问题。创作实践作为艺术家的一种生存方式，是艺术家探索生命真谛并确证自我本质力量的历史精神生活

过程，它涉及理性生活反思的意义和人类自由生活理想确立的价值标准。

由此，创作实践首先是一种生命实践，是人的一种独特的生命价值创造活动，是一种精神的内在反思，也是精神对现实的一种智慧性超越。从具体的创作实践考察中看，创作实践源于生命活动。在艺术实践活动中，生命的历史在反思视野和创作回忆中清晰地展现出来，创作是生命自由的一种象征。在马克思看来，艺术实践只有在自由前提下，才是真正的自由，因为这种自由的获得是以人的主体性解放、政治解放、自由支配时间、物质需要得到极大满足为前提的。

相反，许多非马克思主义的艺术实践观过分强调性冲动、原始、野性对艺术实践的意义，将艺术实践建立在个人的主观意志基础上，而实际上，艺术实践与生命自由之间需要艺术家去斗争，绝不仅仅是一种主观意志冲动，由此，许多艺术家无法调解艺术实践自由与艺术实践强制之间的矛盾。他们在苦难中挣扎，在痛苦中艰难探索，他们的创作实践才显得崇高与伟大。

创作实践同时也是一种技艺实践，即生命实践意向必须通过真正自由的技艺实践方式才能获得。中国传统创作理论对技巧研究延续久远。金圣叹在《第五才子书·水浒传序三》中读到“盖天下之书诚欲藏之名山，传之后人，即无有不精严者。何谓之精严？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章有章法、部有部法是也”。他以“精严”之意识揭示小说之“法”为评点之首务。明万历年间袁无涯本《水浒传》提出“叙事养题法”、“逆法离法”、“实以虚行法”，开创了小说技巧研究之先河，其后袁于令评点的《隋史遗文》、传为李渔评点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金圣叹评点的《第五才子水浒传》，将创作技巧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和细密。清中叶以后技巧研究有所减弱，后来胡适指责金圣叹批评《水浒

的“八股气”，新中国成立以后又被判定为形式主义，技巧研究停滞不前。新时期以后，技巧研究才逐步受到重视。

当然，技巧实践绝不是一种单纯的工具行为。技巧实践是一种不断自我超越的过程，这是一种立足于艺术本性，运用相对确定的艺术工具，创造个人化的艺术语言符号图式，去表现艺术对象，体现生命文化寄托，理解生命意义的过程。只有创作者的技艺与人的生命意志获得高度统一时，他的艺术的精神与形式才获得一种自由完满与和谐。

像创作理论总是在否定中发展一样，创作实践无论是大至创作思潮，还是小至个体创作也是在否定中发展，甚至来得更加明显，这种否定性是与人物的自由发展同步的，这是一种可贵的艺术品格，也往往是推动艺术创新发展的根本特征。

当然，面对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纷繁复杂的小说创作实践活动，我对这种繁复背后隐藏着的富有代表性的具有点的特征的创作实践活动更感兴趣。这些点是一种并列关系，但它们之间又有一条内在的精神勾勒着创作理论与实践之间关系的发展脉络。我希望书中为数不多的创作实践中的亮点，能够大致反映创作理论与实践之间复杂的关系，同时也力求避免为了创作理论的研究而简化丰富复杂的创作实践。

（五）关系研究

历史事件与时间之间并不存在一种函数关系，创作理论与创作实践的主体活动限于各种复杂因素并不呈现历时性的叠加，当我们把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研究对象的材料压缩在一个平面的时候，就能更加清楚地看出被时间干扰了的隐形的内在的关系结构。所以，本研究的内在的核心线索不是“时间”，而是“关系”。

我也不可能完全摒除时间的观念，因为时间的延伸同时也是理论的积淀，虽然这种积淀决不是先后的累积，而是不断地消化和扬弃，我仍然把某一时间段落作为一个“关系时期”来处理，当然其主要依据不是社会历史的变迁，而是在创作理论和创作实践的关系所呈现的时期特征上，是从学术的内部规律来划分的。

创作理论研究，研究创作理论与创作实践之间的双重关系。一方面研究创作理论自身形成过程中的联系，也就是创作理论自身的理论建构问题；另一方面研究创作理论在它所预期与没预期的运用过程中的联系，也就是创作实践活动中创作理论的运用问题。

理论与实践能够完全分离吗？换句话说，离开创作理论而完全来自创作实践的纯粹感觉能单独存在吗？进化认识论认为，这里的感觉和理性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唯理论与经验论争执已久的经验与理性的关系问题，在当代科学哲学的认知理论中表现为观察与理论的关系问题。对这种关系进行的探讨得出了一个已为大多数科学哲学家在不同程度上接受的命题：观察渗透着理论。这个命题提供了我们看待创作理论和创作实践这个问题的新视角和思考这个问题的新方法。“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入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①创作理论和创作实践也在这样的认识关系中不断融合，不断成熟，不断发展。

当然，从科学的历史观来看，对历史的关系的研究是个艰难而复杂的认知过程。历史对后人的启示，既来自于异峰突起的历史行为，更来自于它深刻的复杂性。今天，当我们立足

①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97 页。

于新的世纪，回顾反思 20 世纪末动荡变化的文化现象时，就应该是以一种积极而又审慎的科学态度对待这一切。因为历史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任何一个历史环节或历史活动，它的作用和影响都是一种综合性的效应，既可能有正面的，也可能同时存在负面的。特别是在充满理想与激情的年代，在当时表现为尖锐而具攻击力的创作理论往往可能而且事实上都会表现出某种程度的负面作用，但是应运而生的偏激却往往更能赢得历史的骄傲与尊敬。

二

就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小说创作理论和创作实践关系的研究状况来看，学界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综观这些专著和论文，基本上有四大不足：

一是理论研究的散在性。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理论界就开始了对小说问题的多层次研究，逐步从以感性经验描述为主转向以深刻的理性思考为主，进而感性经验与理性思辨相结合。有关小说的审美、性质、特征、作品、文体、结构、意象、境界、作者、读者、阅读、修辞及文艺心理学、文学社会学、文学阐释学、接受理论与文化诗学等这类问题的探讨，都有专著和论文问世。在这些文学理论的研究中包含着小说创作理论的研究，且基本上都是一般性的创作理论研究，有关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作家和批评家的小说创作理论虽多有涉猎，但各种重要的小说创作理论成果都散见于各种专著和论文中，对小说的故事理论、叙事理论、语言理论、结构理论、创作心理理论都缺乏自觉的历时性、系统性、多角度的总结，更不用说对整个小说创作理

论的宏观总结研究。

二是理论研究缺乏有效的针对性。新时期小说理论研究的开拓性著作是 1982 年叶朗的《中国小说美学》，这部著作虽名为《中国小说美学》，其实只讨论了明代至清末的一些小说评点，未能描绘出中国小说美学的历史全貌，也没有对中国小说美学进行必要的理论概括，尤其是从哲学、心理学、社会学角度来界定小说美学，没有顾及小说作为一种独特文体所具有的文体特征，而这对于小说创作理论研究是尤为重要的。很显然，这种研究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1985 年吴功正的《小说美学》界定“小说是在主体和生活结成的审美关系中进行审美创造”，没有剥离出小说的特殊本质，尤其是创作实践的例证多局限于中国古典小说和 20 世纪以前西方批判现实主义作品。1987 年张德林的《现代小说美学》虽能结合当代小说创作实践，但他是以论述小说家的艺术感受作为逻辑起点，缺乏深入的理论提炼。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陈洪、方正耀、刘良明、王汝梅、张羽、谢昭新、荣文仿等一批学者致力于对小说理论史的总结工作，有对古代的、现代的，也有对整个 20 世纪的，但他们着眼的是整个小说理论史，且多侧重于古代和现代，即使荣文仿、罗爱华等人合著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研究》是对新时期小说理论的总结，但也过于简单与粗糙。

对小说创作理论研究极富启示的成果反而是在当代文学思潮、文学史、文学批评等问题的研究中，如对主体性问题的研究、文学观念的研究、“潜在写作”的研究、文学立场的研究等，这些研究不同程度地涉及了小说创作理论问题，但是这些研究讨论的是各不相同的中心问题，并不是把小说创作理论研究作为新时期文学研究的切入角度，也不是当作一个中心问题来研究。

三是理论研究个性色彩的缺失。中国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小

说创作理论受到了外来小说创作理论的极大影响，也在相当程度上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文学理论思想中的某些因子，但是中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有重要价值的小说创作理论仍是中国作家、理论家在中国现实实践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既留下了中国时代社会的印记，也留下了鲜明的理论家和作家的个人印记，比如王蒙、王安忆、莫言、格非、韩少功、贾平凹、刘庆邦、王朔等人的小说创作理论。但是，研究者们总是更为强调前一因素的巨大影响，比较忽视后一因素。这样我们看到的小说创作理论往往给人一种个性色彩缺失的印象，不仅言说对象个性色彩缺失，而且言说主体个性色彩也缺乏，这样虽然可以较准确地把握小说创作理论的时代主流，但未免过于粗疏，甚至还会产生令人遗憾的遗漏和偏失。事实上，即使是作为媒介，理论家和作家的主体作用也是绝不可忽视的。

四是“学院派”理论研究离文学愈来愈远。“学院派”并不是指在学院工作的理论工作者，而是指那些按照一个个所谓的“学术规范”的论述模式乃至论文格式从故纸堆里推导一个个结论的“学者”们。“学院派”对新时期小说创作理论的研究很少从小说创作活动尤其是当代小说创作及小说作品本身来进行，而是习惯于从文化哲学的大前提出发向小说作单向的演绎，漠视小说创作本身的艺术特殊规律，仅仅是用小说作为说话的材料而去满足宣扬某种理论的欲望，不是沉迷于文学的魅力，而是乐于考察文学周围的知识。理论与小说失去联系，这种现象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走得更远。小说创作理论本身应像小说一样，是新鲜的、丰活的，而不应是苍白的、枯燥的。

在20世纪末期，当人们提出中国现代文论建设患上“失语症”的时候，却很少扎扎实实地从创作理论方面进行深刻的反思，很少从中国新时期文学作品和中国作家自己的创作理论声音

出发去建构我们自身的创作理论。实际上，王安忆、王蒙、韩少功、莫言、贾平凹、余华、残雪等众多作家不断地表达对创作的理解，他们因其观念的新颖、表达方式的自由、才情的勃发、知识的灵动、情感的饱满、表述的透彻深为同行所重视，这是小说创作理论应重视的学术资源。

我们还可以看到，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小说创作理论与创作实践之间，有着相当丰富和复杂的表现形态，它们并不因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的旨向在实践而存在一种一一对应的关系。我们除了追问政治功利原因以外，还应将探索的目光延伸到一些更有价值的问题，如这种“不对应”是如何形成的？这一过程是怎样反映外来小说创作理论主体、中国小说创作主体、中国小说创作理论表述者等多种话语主体之间的较量的？理论家、作家的个体见解、情感体验等必然会灌注其创作，那么这种个体灌注与个性化民族化创作理论的关联如何？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从小处看可以深化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小说作家、作品和文学理论的研究，从大处说，则能有力地推动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民族性问题、中西文化和文学在碰撞过程中如何生成新质等文学学科基本问题的深入研究。

我们通过阅读西方的小说和小说理论与批评，可以发现西方的小说创作实践与创作理论是在互相刺激、互相印证、互相推动下一道发展起来的。当回顾 20 世纪末小说二十年的发展历程，我们有个共识：这二十年的小说创作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相比取得了根本性的进步，与中国现代小说相比，也并不逊色，而这些进步和成就的取得直接地与同时期小说创作理论的变迁有关，与其背后的文化成就有关。但也反映出我们的小说创作理论还未真正地有系统有规模有深度地展开。虽然这与二十年小说家们没有太多的关于小说创作的独到思考与言